

香港针灸发展概况

谢永光

香港属于中国领土,鸦片战争后由英人占据,由于香港居民大多信仰中医治病,1841年英人正式统治香港时,英政府曾作出承诺,尊重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保留华人有应用传统医疗方法行医的权利,因此华人针灸师在香港用传统医术行医,当局不加干预,亦无立例管制。针灸师一般不需向医务卫生署办理注册及申领执照,通常只需办理商业登记,即可开业。估计现时全港执业针灸师超逾三千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未结束之前,针灸在香港已濒于失传。1930年5月承淡安先生在无锡创设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在国内外广征研究社员,以复兴针灸为己任。当时香港人士参加学习的有卢觉非、卢觉愚、曾天治等人,笔者稍后也参加该社通讯研究。

战前在香港从事针灸专科者仅有曾天治、郑师道、陈钟示等三数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从内地逃难南来,在港开业的针灸医师增加了陆崇常、周仲房、马其芬等人,其中周仲房原是广州广东中医专科学校针灸科讲师,1938年广州沦陷后随校迁港而来。

香港最早设立的针灸教学机构是在三十年代末期由曾天治主办的科学针灸医学院,以及同期稍后由卢觉愚主办的实用针灸学社。抗战期间,曾天治在香港及内地也曾设帐授徒,桃李很多。早期广州的庞中彦、伍天民、李千里以及香港的苏天佑、邓昆明、梁铁生、谢礼卿、吴石垣、庄树民等都是他的弟子。辛亥革命后广东早期针灸医事人材的培育,曾天治应享大部分功劳。

卢觉愚幼年曾肄业香港官立英文学校,不仅中文造诣很深,还精通英文。卢氏学贯中西,早在1934年即为江苏《针灸杂志》撰文报道“突眼性甲状腺肿病针效之研究”,这是香港针灸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同年卢觉愚根据承淡安著的《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并参考美国格雷戈里所著《手术整脊治疗法》一书所载脊椎神经循行的插图,写成《关系针灸学术之经穴神经表解》,他是我国将针灸经穴与神经系统关系作了精细描述和对比工作的第一人。1926年卢觉愚膺任香港东华医院首任中医长,历时14年(1940年由潘诗宪接任),1941年任香港中国国医学会(香港中医师公会前身)兼学术部主任,创立第一届医师研究所、医学演讲会,并

主办《伤寒论》和针灸讲座,著有《针灸问答》、《觉庐医案新解》、《实用伤寒论讲义》、《实用针灸学讲义》、《临床针灸要诀》等书。在三十年代的广东地区,卢觉愚与广州著名中医谭次仲、西医张公让都是中医科学化运动的先驱,以沟通中西学说倡导于时。在战前卢觉愚兼任无锡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香港分社社长,1954年总社社务结束。七十年代卢氏在香港协助同门重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79年改名为中国针灸协会,并任名誉社长。1981年3月28日因病去世,终年83岁。卢觉愚对香港发展中医事业的功绩不容磨灭。

三十多年来,由于受到内地提倡以及重视研究针灸的影响,香港中医界掀起学习针灸的热潮。当时香港学习中医的风气相当旺盛,前任广州汉兴中医学校校长方德华来港主办汉兴中医学院,张公让主办中国新医药研究院,除了陈存仁主办中国针灸学院,苏天佑主办香港针灸专科学院,邓昆明主办邓昆明针灸学院之外,邓悟隐主办的广中中医学院和方德华主办的汉兴中医学院都先后设立针灸班,陈居霖主办的现代中医药学院也教授针灸(以函授为主)。此外,继1954年成立中国针灸学院后,其他各中医师公会附设的中医学院及各中医学院亦都先后设立针灸班,笔者主办的国际针灸研究所于1954年开始正式招生。在上述针灸院校中以陈存仁创办的中国针灸学院较具规模,该院聘请香港针灸界的精英担任教席,由梁玄担担任专任讲师,邓昆明、苏天佑、周世民等担任特约讲师(笔者当时亦被邀任为特约讲师),为港埠培育了不少针灸人才,后来组成的中国针灸学会(香港),其会员多为该院历届毕业同学。中国针灸学院举行第一、二届毕业典礼时,曾假座美丽华酒店举行法德两国针灸文物展览。张公让主办的《中国新医药杂志》曾出版一期《针灸专号》,中国针灸学会(香港)亦曾出版过几期《针灸文摘》,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地也有人专程来香港研究针灸。当时学习针灸的风气可称蓬勃一时。

香港的中医药(针灸)院校不属教育司署管辖,不受教育条例约束,只要领取商业登记证便可开办。战后香港办理比较完善的中医院校当推范兆津主办的菁华中医学院和谭宝钧主办的中国国医学院。香港各医

学院均未设有针灸课程,医学院学生多系私下醮资,自聘针灸导师进行研习。在五十年代由香港专程到日本学习针灸的有银行家许密甫和已故上海名中医丁济万的哲嗣丁景源二人。曾天治弟子梁铁生1954年借赴欧洲讲学机会,在法、德等国宣扬针灸学。

现时香港主持针灸研究的学术团体有中国针灸协会、中国针灸学会、香港针灸协会、香港中华针灸医师学会、香港针灸医师会等。这些机构主持人多为承淡安的门人或其再传弟子,因此追本溯源,香港针灸界实为由承淡安所一手蕃衍起来的。其中中国针灸协会的前身是无锡中国针灸学研究所,1970年在香港重组,1979年改称中国针灸协会,由笔者担任会长,主理会务,卢觉愚任名誉会长。中国针灸协会会员遍及世界各地,出版有《针灸医学》会刊,并设有针灸专修班等。

香港针灸界与各国展开联系及交流始自五十年代。1953年日本东洋医学会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的国际性学术大会、1965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均邀请香港有关学术团体参加。以后相继参加了1973年在汉城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1977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世界针灸学术大会、197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1979年在汉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针灸学术大会、198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东南亚中医药学术大会。除第六届世界针灸学术会议由当时出任香港针灸协会主席、巴黎国际针灸协会驻香港代表黄学礼出席参加外,其余四次会

议均由笔者率领香港代表团参加。1977年笔者应邀赴东京和南朝鲜讲学。香港有关针灸的各学术团体经常组团回内地进行汇报及交流,也常组团赴台湾参加有关学术会议。1979年1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应邀到香港讲学,曾以针灸为题在理工学院作专题演讲。在留港期间并曾与笔者会晤。

有关针灸的专门著作,除了上述卢觉愚的著作之外,还有苏天佑的《艾灸防癆》、《针灸实录》;笔者的《新针灸讲座》、《中国针灸传海外》、《针灸美容术》、《针灸创新》、《针灸麻醉资料特辑》;庄育民的《针灸与气的关系》、《针灸与中风专辑》;陈太羲的《穴位解剖意象图》;谢成的《实用新针灸学》;余永锐的《针灸新谈》;黄伯平的《新针灸验集》;何国萍等编的《针灸的科学研究》;罗志刚编著的《中国针刺经穴学》(英文本)等等。内地出版的《耳针》、《头针疗法》、《针刺麻醉》等书,也有人将它译成英文出版。

由于针灸的深入人心,香港大学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和一些比较开明的西医,也都纷纷进行了针灸研究,在针灸治疗眼疾恢复视觉、针刺戒毒和针刺镇痛原理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由于香港现行法律是禁止非西医使用西法医疗仪器,使中西医结合理想无法实现;加以受到当地高地价政策的影响,醮资筹组中医(针灸)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困难重重,以及学员毕业后难以找到出路等等,对今后中医(针灸)的推广和提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消 息

一、本刊讯 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将于1984年8月7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针灸治疗各科常见病和某些急性病的临床应用及研究;针灸学说的理论探讨和补泻手法的临床应用;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和原理研究。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中国针灸学会和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公司,委托香港国际交流服务有限公司代办出席会议的各种必要手续。香港国际交流服务有限公司的地址为:香港、九龙、尖沙嘴,北京道57号国都大厦,401/2404/5室。

二、1983年10月17日至20日,奥地利针灸与耳针疗法学会在维也纳组织召开了世界科学针灸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奥地利等27个国家共500多人,应该学会的邀请,我国由王雪苔、王德深、周允娴和翁嘉颖4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代表我国在会上报告了5篇论文。会议期间,还成立了“国际针灸与有关技术医学会(ICMART)”,这是继总

部设在巴黎的“国际针灸协会”之后又一新成立的国际性针灸学术团体。(王德深)

三、中国“今日中药展览”于1983年11月5日至16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由王玉川、李经纬、王绵之、路志正、李葆平、甄志亚、张世臣、胡世林、何树槐、张问渠组成的我国中医中药专家组,在展览会期间,举行了中医中药学术报告会,共报告了9篇论文。参加报告会的除来自泰国各地的中医中药、泰医泰药以及有关大学、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外,还有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朝鲜以及香港和台湾的许多学者共400余人。中国专家组还应泰国同道要求,在展览会中设立诊室治病,受到病人的热烈欢迎。(成甫)

四、应香港医学会的邀请,北京医学院李顺成医师受中华医学会的委托,赴香港参加1983年9月26日至30日的“科学周”活动。在这期间李顺成医师作了“中国针灸研究30年概况”的报告,并主持放映了“针刺麻醉”的录像带和“中国医史”的电影,受到了与会同道的热烈欢迎。(穆川)